

草木散记

夏至才找到一棵野绿苋

何频

颇不易！寻寻觅觅，来来回回，直到6月20日夏至的头一天——郑州天上午，八点左右太阳就火辣辣灼人，而我侥幸在一并临时开辟的青菜畦里，透过大叶白米苋肥大的丛苗，发现夹杂其中的一棵野绿苋。

终于找到了！说野绿苋是不准确的，必须叫它野绿苋。因为它不是家常蔬菜中的绿苋菜，二者并不一样，从小和大人一起叫它米苋菜。人到中年的时候，远游到内蒙赤峰和河北怀来一带，那里地近高原此物多，人们也爱吃它叫它西凤谷，对呀！对呀！这是它在野菜谱里经典的名字。可以说今年之前，打我记事起，几十年漫漫人生路走来，米苋菜都是随处可见。每年“五一”过后，马齿苋、野绿苋和扫帚苗，这些好吃的野菜，见缝插针，星罗棋布，蓬蓬勃勃生长，下一次雨就出一茬新苗。它们如开春的白蒿、荠菜和莴笋菜一样，予以采摘，予沼于汜。祖祖辈辈，我们采不尽也吃不够。野菜于土地，像大自然一手导演之盛大典礼仪式上的团体操，随机出现在人间运动会的背景舞台上，花样百出，魔幻无比。理查德·梅比之《杂草的故事》，幽默地针砭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独断专行，实用主义地给野草分类，而杂草于作物，只是一时站错了队而已。

野菜古矣！《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自从盘古开天地，大河两岸的杂草与野菜多如牛毛，我列举的只是其中的“好味野菜”，可入《山家清供》和《遵生八笺》。如白蒿刈藜，可用于祭祀；荠菜苦菜，谓谓荼苦，其甘如荠。它们侧身野菜之列，若满天繁星中的北斗七星一样，耀眼而具有指示意义。

习见之物突然见不到，自然若有所失。有的是随着“城中村”的消失而淡出我的视野的，例如地肤，土名扫帚苗，有几年没有见过它了。周书里的独扫苗即是，其籽名曰地肤子。当下却和

藜藜、苘麻、曼陀罗一样，颇不容易遇到。王敦煌之《吃主儿二编》写到扫帚苗。他说老北京在院子里种野菜不多，但是偏要种扫帚苗，这是个例外——有的东西不同，就如比如说扫帚菜，是把它种在花池子里了，一种就是二十多棵，不为长长了做扫帚，就是趁它嫩的时候，掐尖儿吃鲜儿。也不容它长大了，它要是长大了，那是个挺大挺大支棱起来的梗子……所以每年种，长出来趁着嫩就掐尖儿，长到一定程度，杈子上没什么嫩尖的时候，就把它拔了请出去，省得在这儿添乱。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没有不好吃这口的。这东西别瞧就是种野菜，但其口感绝对在菠菜、小白菜等时令蔬菜之上。把洗净，用沸水焯过，或是用点儿调好的芝麻酱那么一拌，或是来点儿香油加点儿醋，再拍上几瓣蒜也是一样。两种吃法异曲同工，吃口都是那么地道，令人垂涎。

我家出门而大道以东，是新起的大小凤山、北龙湖和金融岛，曾经的郊区农村没有了，沧海桑田演绎于眼前。昔日种庄稼的农民现在种花草打理花草，每天似飞鹤一样，早出晚归——早上挤着汽车或农用车赶来，在新辟的绿地绿廊里，围成大半圆为绿地除草，仔细剔除包括莎草、小菊、蒲公英在内的异类。城市草皮，绿地要整齐划一，再好的野草花都被排斥。但野草泼皮，除之不易，曾有女人拿着农药百草枯，精准打击莎草——持废旧的笔头仔细在莎草绿皮上涂抹农药。可夏天的马齿苋与莎草，即使你连根拔掉，它们得一点晨露和雨水立马就焕发生机。

野绿苋和扫帚苗集体失踪，与环境改变有关，郊区农村和“城中村”消失是关键。此外，也与连年疫情和越来越严格的防疫措施，导致我踏访区域日益狭窄和直线化有关。

如果说，那与我邻多年的校园，因为防疫，日益戒备森严，我几乎一整年都没有进去过了。附近大小单位和小区、家属院的门禁管理严格，曾经熟

悉的地点地盘，杳见角落全不能到了。就连大道的绿化带绿廊，大道东的森林公园，游览路线被格式化了，禁令标志多多，我再也不能漫不经心走野马和望野眼了。

如果你不曾低头注视过足下的土地，猛故瞰一下，隙地植物品类之多会令你震惊。不要说我的四季远足，就是居此长达二十多年的老院子，仔细数一数，盘点一下已有的树木花草，翻阅一册《塞耳耳博物志》亦五色斑斓。

中原延伸到辽阔北方，一如《国风·七月》的节奏，世代延续着并没有改变。因为它演绎着自然与四季转换的节奏和韵律。那《采芣》《采芣》《采芣》——《卷耳》《采芣》《采芣》——《中谷有蓷》《野有蔓草》《南山有臺》《墙有茨》《园有桃》《山有栝》，林林总总，多姿多彩，不仅是自然板块上的装饰符号，它对于编户齐民，凡夫俗子，助其坚韧生活，繁衍最好，也是一重大的寄托。如果没有早春的白蒿荠菜，没有清明柳和端午艾，流水般的日子将失魂落魄。野菜，即使是大城市的人工野菜，园艺荠菜、马兰头、枸杞头，等等，人们传承吃货尝鲜，包含着与生俱来的荒野情愫。

这就必须要说野绿苋。野绿苋虽然在毛诗里缺失，但它出名比毛诗还早。《周易》：“苋陆夫夫，中兴无咎。”《说文解字》曰：“苋，苋菜也。从草见声。”《救荒本草》记录苋菜，野绿苋混为一谈。而《河南野菜野菜》，将三种野绿苋逐一分别记录在案——刺苋、绿苋和野绿苋。它们之中，口味最好的是绿苋野绿苋。今夏一开头，我四处找不到野绿苋，没有办法了，趁着东风集贸市场，在卖桃卖瓜人捎带的野菜里买了一把。我将这野绿苋择净，去掉紫红色的根须，掰去硬老多余的茎秆，开水焯熟，放冷水里浸着。中午吃面是大碗捞面，随锅放这现成浸过的野绿苋，仿佛杜甫的冷淘饭。诗圣过夏，用国槐叶制作饮食：“青青国槐叶，采掇付中厨……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苻。”《槐叶冷淘》我则喜爱野绿苋。野绿苋叶厚叶粗耐咀嚼，具有独特风味，而且包含着故乡的记忆。

扫帚苗与野绿苋的消失，似乎也与气候暖化相关。一些原本不属于中原地区的南方杂草，例如毛叶龙葵、白花鬼针草和鸡矢藤等等，反而逐渐多了起来。我不是刻意排斥它们，我也挡不住。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地盘和社群。我们视野狭窄。我们在走过的路上来来回回；我们熟悉这里的地形和气候，我们能一眼认出这里所有的常客”。年轻的英国作家理查德·史密斯，在其《天空的小社群：隔离期观鸟之乐》里这样开头。

是的，我被这句话击中了！ 2022年7月4日，壬寅六月六于 廿草居



笔会 素履以往 (漆画) 徐孙浩然 牛扬艺翔

家书，失落于忘川

胡晓明

车。至于微信时代，那更是快速反应：你如果上午收到信息，下午才回复，人家都觉得你是怪物。

有一天我终于想起来要写一封家书了，可是远方的儿子却再也不回复我的信，我由怒而生怨，又释然，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没有家书的生活，一种从来不让时间慢下来的生活，家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属于遥远的古代了，我们忽然变成了书写文化时代的孤独的遗老。而儿子从微信上传来的信息，就像遥远的太空当中很微弱的信号，一闪一闪，若有若无地浮动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家书的当代意义，是重建一种手写的文化，敬正的书写，留下一些真正的情感，严肃的思考，而不是即时反应式的浅碟子思维。

家书的第二个意义是它的非虚构。五四新文化的时候，小说与诗歌前所未有地抬高了地位，我们先辈们认为真文学最根本的是要虚构，要创造，要想象力，这样舶来的文学观与理论，轻易抛弃了几千年中国文学非虚构的主流，讲求形象化、典型化、浪漫主义、幻想、虚构、虚拟、假定性……元化师给我说过一件事，某年他跟作家团出国，与一名作家发生争执。元化师说文学是“说真话”，那作家偏说文学是“说假话”，这番争论，除了概念的不聚焦的区别，这背后当然有新旧文学深刻的区别。韦勒克、沃伦说：“如果我们承认‘虚构性’、‘创造性’或‘想象性’是文学的突出特征，那么我们就是以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济慈等人的作品为文学。”《文学理论》第二章《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不反虚构，这样的文学可以拿大奖，可以当大作家，但是距离普通人的生活较为遥远。我们还是怀念一张纸一支笔的家书时代，我们的中国古代作家有那么深厚的家书传统，但是都被我们遗忘于忘川之中。

家书的第三种意义，是日常人生可以普遍使用的文学，可以细腻地记叙心情与人事，生活中琐碎真切点点滴滴的感受，所谓百姓用而不知，然而极高明而道中庸，天理不外人情，当中可以内化古已有之的圣贤消息，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从“柴水之劳”与“时鸟发声”，说着说着，就说到如何是“羲皇上人”的感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训，看起来是小，但是实际上不可小看，很多家书都能见其大。

我们现在发现小孩子怕写作文，他们觉得作文没东西可写，课堂上教的比较假，不是他们的生活。所谓好的作文，喜欢用一些好辞好句，长于浮华的表现，书上得来终觉浅，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而是缺少一种人生实在的在场感。像黄山谷写给他外甥的家书，居然讲东坡的坏话，叫你不要跟他学坏了。——这样的书写，表达很本真。而如果一个孩子平时有家书的训练，作文摇笔就来，他的作文一定不缺少饱满真切的生活实感，一定会是优秀的作文高手。

当代家书的意义，还可以语文扶贫，帮那些困难群体写信，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工，没有办法写作的残疾人和老人。年轻的大学生能不能去帮他们代写家书，寄给远方的孩子和亲人？我的一个朋友，台湾的一个名教授，说他之所以走向文字工作的这条路，就是因为他在七八岁的时候，搬一个小板凳，在村子的老槐树下坐着，听那爷爷奶奶们，一个一个地口述，代他们写信、疏愁、问候……每当想起这幅画面，我就会怀念那个村庄，那是一个多么古朴真挚、有人情味的村庄。

我们再往大处说，家书可以复苏一个重视家庭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从家开始的，仁心感通，以亲亲之爱推扩出去，到整个社会的关爱，将冷漠的现代陌生人社会，变成有情有义的社会。林毓生虽然严格区分家庭与社会，但依然承认：“在家庭伦理架构中发展出来的亲情，是人生中最可珍惜的情感之一。”“絮矩之道，是指家庭成员要站在其他成员的立场为别人着想。家庭是人生中情感发展的自然场所，纯正的亲情呈现了人生中最高尚的境界之一。”融入现代人观念的家庭，“构成子女身心正常成长的环境，同时是儒家所揭示的以人生中最可珍贵的亲情为基础的家庭观念，因此能够进一步合理地落实而获得新的认同。这是中国家庭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议》）

最近一本新书，法国两个哲学家更进一步，几乎完全印证儒家的道理，他们认为“人道主义的思想源头就是那句古老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道主义拒绝冷漠，这份爱渗透在私人生活里，也显然影响着我们的集体生活。”这本书既继承又批判了尼采、海德格尔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提出以“爱的哲学”、“爱的政治”为宗旨的第二次现代人文主义，在家庭感情与公共领域间搭起桥梁，从家庭对亲人的关爱，对孩子的爱开始，然后让整个社会富有爱心。“我们留给孩子的世界与我们留给全人类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已经无法区分。”（《费希·卡布里耶《最美的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越来越走向一个现代性的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社会，家书这样的价值可以让他重返传统，可以让空心化的社会具有心肝，这就是儒家所谓仁性感通的社会。

往深处想、大处想，家书可以做的事情还真不少。大家一起努力。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七日

汪曾祺又一笔名“曾淇”

陈建军

1985年3月7日，汪曾祺在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编委会信中说他发表作品，大都用真名，很少用笔名；又说他1949年以前“写散文诗，偶尔用过‘西门鱼’的笔名”，1949年以后“不便用真名发表作品时曾用过‘曾歧’、‘曾著’为笔名”（《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页）。其实，汪曾祺用过的笔名并不算少，除他自己所说的三个之外，另有曾祺、汪曾旗、汪曾琪、汪若园、郎画廊、余疾、葵枝、方栢臣、曾歧、曾芪、曾芪等十几个。他以这些笔名所发表的作品，几乎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精装版、2021年平装增订版《汪曾祺全集》。不过，也有漏收的。1950年11月18日，汪曾祺以笔名“曾歧”在《光明日报·创作学习》（北京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系主编）第14期上所发表的短文《从〈陈八十〉谈起》，全集就未收录。

此外，汪曾祺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曾淇”，是他发表《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时所使用的。这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朝阳》1950年9月21日第339期，为免阅者翻检之劳，兹将全文过录如下：

《北京文艺》创刊号九月十日出生。这是由北京市文联主编的一种综合性的文艺月刊。

这一期内有老舍的三幕剧《龙须沟》（本期发表第一幕）写天桥以东一条有名的臭沟的历史，沟边劳苦人民的生

活，解放前后沟和人的改变，及时的反映了北京的现实事件，并表现了它的丰富的和深刻的意义。小说三篇：李伯钊的《富富有》挑出一个翻身农民一生中几个最要紧的阶段，用干净痛快的语言直叙出来，因而也就托出了他的生活的全面。端木蕻良的《蔡庄子》写土改过程中老实农民受了地主蒙骗，终于认识了地主的面目，跟他作了坚决的斗争，写的曲折前后一个晚上的事。作者的笔紧跟随着当事人物而活动，极其周密详尽。两篇都是写的农民和农村，一个是繁简各不相同，两种表现方法搁在一起，正好可以作个参考。张志明的《该从那儿出发》写两个战士，一个没病装病，直想回家；一个有病吐血，可是不肯复员，后来闹清了“该从那儿出发”（从革命利益出发还是从家庭个人出发），都走了正确的路。这是一个新的题材。《把曲艺提高一步》王瑶卿访问记《戏剧改革问题座谈会》是有关戏曲改革的三篇文章，但里面接触到问题则很多是相关的。王亚平在《把曲艺提高一步》中具体明确的指出了目前曲艺作品中的缺点和曲艺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值得注意。两篇报告，《波茨坦日记》写了波茨坦无忧宫的华丽，也写了军国主义者弗利特利希第二的专横和淫奢；《劳动改造北京》（风子是人民公安部队生产运动的）一个是综合报导。连写两篇，江山的写觉悟了的工人在“过磅”当中表现的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宋永章写了因为教工人夜校而和工人密切结合

起来的“愉快的日子”。诗歌四篇，从题目上即可看出它们的不同的内容：《可爱的梳毛机》《炊事员薛天宝》《快板唱写作》《保卫和平歌》（有谱）。作者是周宏才、丁丁、孔延庚、王亚平和芦肃。为了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鼓励一般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提高思想水平，举出了《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光荣人家》《清官秘史》三部影片和话剧《台岛之夜》，加以评介，总题为《舞台与银幕》。所评介的虽然不多，但是因为举出了典型，所提的问题是一般的，这个工作实在很有意义。

由于文联会员的贡献和要求的不同，所以必须容纳文学和艺术各部门的创作和批评。但是文联在组织稿件时有它的重点：它尊重工人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发动会下厂，创作以工人生活为主题的文艺；要求作者书画、报导、歌颂北京在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到生产城市的过程中的各种伟大生动的现实事件；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刊物，对里面接触到的问题则很多是相关的。王亚平在《把曲艺提高一步》中具体明确的指出了目前曲艺作品中的缺点和曲艺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值得注意。两篇报告，《波茨坦日记》写了波茨坦无忧宫的华丽，也写了军国主义者弗利特利希第二的专横和淫奢；《劳动改造北京》（风子是人民公安部队生产运动的）一个是综合报导。连写两篇，江山的写觉悟了的工人在“过磅”当中表现的认真负责的劳动态度；宋永章写了因为教工人夜校而和工人密切结合

而且，因为它兼收并蓄，也能够使不同部门的文艺工作者能够互相观摩学习，交流沟通经验，吸取彼此的长处，从而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工作，而且

通过了作品和批评，也才能够把文学和文艺的各部门的工作更好的团结起来。我们相信，《北京文艺》是可以负起这个任务的。

为什么说署名“曾淇”的《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是汪曾祺所写的呢？1950年5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不久，汪曾祺从武汉返回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市文联。9月10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创刊。《北京文艺》办刊宗旨是：一、努力反映北京的生产建设；二、歌颂北京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过程中史无前例的现实；三、鼓励、帮助青年学生学习、创作，在将来的文艺高潮里也尽一些力量；四、倡导旧戏曲改革，既要介绍新编的与改编的戏曲，也要提供戏曲改革的意见（《发刊词》）。《北京文艺》是一种综合性文艺月刊，其创刊号（第1卷第1期）刊载有戏剧《老舍〈龙须沟〉》、小说《李伯钊《富富有》、端木蕻良《蔡庄子》、张志民《该从那儿出发》》、诗歌《周宏才《可爱的梳毛机》、丁丁《炊事员薛天宝》、孔延庚《快板唱写作》、王亚平、芦肃曲《保卫和平歌》》、报告《冯至《波茨坦日记》、风子《劳动改造北京》》、速写《江山《过磅》、宋永章《愉快的日子》》等。从所刊载的作品及《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来看，《北京文艺》创刊号可谓充分贯彻了其办刊宗旨。

《北京文艺》的主编为老舍，王亚平任副主编。除老舍、王亚平外，编辑委员尚有王春、王松声、王颖竹、沙鸥、余世光、胡冀、苗培时、冯至、张梦庚、风子、端木蕻良和芦肃。汪曾祺虽名列编辑委员，但他也是编辑部总集稿人。关于《北京文艺》创刊号，由作为“大管家”（黄永玉语）的汪曾祺亲自撰文介绍，是再合适不过了。

汪曾祺喜欢以“曾”加上与“祺”谐音的字作为笔名，“曾歧”“曾歧”“曾芪”即是，“曾淇”也是。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断定“曾淇”是汪曾祺的又一笔名，《介绍〈北京文艺〉创刊号》是他的一篇集外文。